文史资料选辑

第六十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抗战前我勾结日寇的罪恶活动…… 德穆楚克栋鲁普（ 1 ）
百灵庙蒙古“自治”运动的前后 —— 改元易帜，设立伪蒙古军总司令部—— 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前后
——在日寇策划下进犯绥远的经过
李守信投敌经过 …… 刘映元（43）
日寇侵略华北与冀察政权的形成…… 刘家鸾（51）
日寇在绥远强设特务机关的经过 …… 曾又馨（59）
外蒙古见闻纪略 …… 路履仁（65）
《新民报》二十年 …… 陈铭德　邓季惺（83）
英帝统治下的开滦煤矿 …… 王冠东（157）
开滦煤矿的“包工大柜”…… 耿子祥　王国桢（193）

抗战前我勾结日寇的罪恶活动

德穆楚克栋鲁普

从“九一八”事变以后，我为了实现个人的政治野心，逐步走上了背叛祖国、勾结日寇的罪恶道路，为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深入内蒙，把持军事，操纵政治，垄断经济，制造了方便条件，给内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经过解放以来党的改造、教育，使我认识到自己罪恶的严重，同时也体会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内蒙人民才得到了解放，才有真正的自治和繁荣。现先将我在“七七”事变以前的罪恶活动写出来，今后还愿继续写述，以告罪于全国人民。

百灵庙蒙古“自治”运动的前后

1.“九一八”事变后日寇最初对西蒙的阴谋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了东北四省，内蒙古东部各盟旗也随之沦陷。继而日寇的侵略魔掌又伸向西部各盟旗，首当其冲的是与热河接壤的锡林郭勒、察哈尔两盟。它初则以“满蒙联合”为口号，企图诱使各盟旗王公加入伪满，继又以所谓大蒙古主义煽惑各盟旗王公，说什么“收复故土”，“恢复成吉思汗的旧业”等等。日寇除派遣特务间谍深入各盟旗进行秘密活动外，并不断派遣军政人员前来进行政治拉拢，威胁利诱，无所不至。

在百灵庙蒙古地方自治运动以前，日寇拉拢蒙古王公是以锡

盟盟长索王(索诺木拉布坦)为主要对象的。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关东军曾派依田四郎到乌珠穆沁右旗劝诱索王"归向"伪满。嗣又派参谋田中玖带同蒙语翻译金永昌前来劝诱索王赴伪满参观,并要求在锡盟设置特务机关,安装电台。索王因在"九一八"事变后曾派人到海拉尔向凌升探询日本对蒙旗的态度,凌升表示说:"日本人最厉害,最好不要同日本人合作。"从此索王对日人存有戒心,因而使日人的两次诱骗阴谋皆未能获售。

当时日寇虽以索王为拉拢的主要对象,对我这个副盟长(我当时是苏尼特右旗札萨克兼锡盟副盟长)也并没有放过。早在一九三〇年冬,驻在张家口的日本特务盛岛角芳等曾以游历为名,到我旗以及贝子庙、浩特济左旗、乌珠穆沁右旗进行活动。一九三一年夏我到北平时,盛岛和日本军事教授英佐在扶桑馆请我吃饭。席间盛岛盛赞成吉思汗的"丰功伟业",以迎合我、煽动我。一九三二年,日本陆军大将林铣十郎、大佐松井石根函介笹目到我旗"游历",到后却冒充喇嘛,长期潜伏在我旗庙上做谍报工作。盛岛也常来我旗、贝子庙、乌珠穆沁旗等地活动。

2. 向蒋要内蒙军权、政权均未如愿

我早就抱有掌握内蒙封建统治大权的政治野心。"九一八"事变后,我看到国民党政府无力顾及边陲,就想联合各盟旗王公,乘机向国民党政府讨价还价,以扩充自己的实力,提高自己的地位。一九三一年冬,蒙古各盟部旗联合驻京办事处处长兼蒙藏委员会蒙事处处长吴鹤龄,将他一手制定的"蒙古各盟部旗组织法"呈请国民党政府明令公布。国民党政府制定这个组织法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它对内蒙的控制,这对于实现我的政治野心显然是不利的。于是我就以锡盟代理盟长的名义(其时锡盟盟长索王在病假中),托滂江电报局长徐茂侯代拟电稿,致电国民党政府反对这个组织法。同时派锡盟驻张家口办事处处长补英达赖赴北平,面见国民党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洽请拨给枪枝弹药等物;并联络包悦卿、

贺喜业勒图默尔根(号颖伯,即小卓王)、达密林札布(太仆寺旗前任总管)等,以蒙古旅平同乡会的名义,致电国民党政府,一面反对吴鹤龄的"组织法",一面吹捧我"素孚众望,洽顺舆情",应出任"蒙旗宣抚使"。包悦卿、达密林札布二人并到南京活动,大肆吹嘘,说我拥有五千骑兵,是蒙古具有实力的人物。

这两次电报的拍发,和包悦卿等的吹捧,引起了蒋介石对我的注意。一九三二年秋,蒋派他的亲信桂永清和军政部派到察盟以枪换马的余玉琼、彭秉离等前来我旗访问。这时包悦卿也由南京北返,陪桂永清一同前来。桂永清对我恭维备至。包悦卿将蒙古旅平同乡会曾电请派我出任"宣抚使"事和桂永清谈了。桂对包悦卿说:"我看德王是个青年有为的王爷,宣抚使是老年人干的事,他干这个干吗?依我之见,应当组织军队,扩充实力,并在蒙旗先组织一个骑兵师或旅,当一个中将师长或旅长,不比干宣抚使好吗?"包悦卿以此话转告我,我当下表示首肯。桂就给蒋介石打电报,并将电报原稿交由包悦卿转与我看,全文记不清了,仅记得有"将来收拾蒙事者必属此君(指我)"一语。桂对我这样重视和吹捧,使我非常高兴。后来他表示想去看索王,我就派我的专用汽车把他送到乌珠穆沁右旗。他回来向我说:"我看索王凝神注目看人的神气、静听别人谈话的态度,是一个具有成见、十分固执的人,可能对你的事业有障碍,希望你注意。"他临行时,又对我说:"静候佳音吧,蒋委员长可能召见你。"

果然他走后不久,蒋介石就打电报要我前往武汉去见他。我就偕同补英达赖、韩凤林、丁我愚等前往武汉。到武汉后,次日即前往见蒋。蒋在谈话中表示对我很关怀的样子,但是关于桂永清所说组织蒙古骑兵之事,并未详谈,仅嘱我和秘书长杨永泰、参谋长曹浩森接洽。我就令韩凤林拟具蒙古骑兵师编制计划和所需要的武器,送交行营办公厅。杨永泰和曹浩森接见我时,说要给我一个"蒙古保安统监"的职务。我当下想到:索王是锡盟保安长官,我如担任保安统监的职务,地位就在索王之上,可能引起索王的不满,不如担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任蒙古骑兵师长既实惠又相当。当向杨、曹表示说："我此次来见委员长，不是专为要官而来。"杨永泰马上表示不甚愉快的神气，没有再作什么回答，我就辞出归寓。

我在武汉作了几天的参观游览后，行营秘书邓文仪来见我说："关于编制蒙古骑兵师事，委员长指示以后再行考虑；至请发武器一节，可以拨给机关枪四挺、步枪数百支，可在此具领，另拨迫击炮二门，须到南京军政部洽领。"我遂派丁我愚前往行营军械部门领到机关枪四挺；所发步枪数百支，因均系破旧之物，未即具领，请另补发。

在武汉告一段落后，留下丁我愚洽办未完之事，我就偕同补英达赖、韩凤林等返北平，依据蒙藏委员会关于"重选盟旗代表、改组办事处"的命令，进行重选代表、反对吴鹤龄的活动。这时，除锡盟已确定郭尔卓尔札布、补英达赖为代表外，乌盟也确定拉希色楞为代表，伊盟确定僧格林沁为代表，并均已先后到达。其他各盟旗代表就在北平酝酿重选，结果又确定贺喜业勒图默尔根、多尔吉为哲盟代表。呼、昭两盟因既已沦陷，又无适当人选在北平，没派代表参加。组织就绪后，就赴南京请愿。国民党蒙籍中委白云梯、克典额等想利用晋京代表请愿的声势和取得蒙旗地方实力的支援，特怂恿军政部长何应钦来电邀我赴京洽商蒙事。蒙藏委员会总务处长陈敬修也来北平迎接班禅赴南京，特到嵩祝寺见我，表示欢迎我和班禅同车南下。这时吴鹤龄已被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解除了蒙事处处长职务，调任参事闲散之职，并命令他重选蒙旗代表，改组办事处。吴鹤龄在这种压力之下，就匆忙由南京赶来北平，请于华亭（蒙名罗布桑车珠尔，系吴岳父的喇嘛弟弟，后还俗为"镇国公"）出面奔走联络，托班禅的堪布和乌盟的德瓦根敖等居中调解。吴鹤龄偕同于华亭曾亲到嵩祝寺和我见面，接着又由班禅出名宴请我们，堪布们代表班禅陪同我们聚餐，并劝我们合作。继又由德瓦根敖、拉希色楞等出面，在撷英番菜馆宴请我们，进行调停，但我俩均未表示接受。

我和班禅同乘专车到达南京后，一面见何应钦洽办请拨武器之事，一面和晋京请愿代表商洽进行反对吴鹤龄、改组办事处之事。吴鹤龄又请巴文峻出面调解。巴曾到中央饭店见我说："吴鹤龄业已表示愿意奉令改组办事处，他只担任卓盟代表，其他各盟旗代表均由新代表担任。"我没有接受巴文峻的调停，并内定补英达赖为新的办事处处长，准备接收。后来因白云梯与石青阳争权夺利，改组办事处之事就被搁浅下来。我表示要整装回蒙，以示对抗。

为时不久，蒋介石由武汉返回南京，先在励志社宴请我和各代表，继又由桂永清陪我到中央军校和他谈话。桂永清把建立中央军官学校张北分校计划谨请蒋阅看。蒋略加翻阅即放在一边说："现在决定在张北设立分校（按张北分校后来没有办成），特派桂永清按照黄埔的精神办理，培养蒙古方面的军事干部人材，为编设蒙古骑兵师做准备。"继又说："蒙古三公制度是可以存在的，希望不要为此操心。"

现在回想起来，桂永清到我旗访问时为什么向我建议组织蒙古骑兵呢，我到武汉见蒋后为什么杨永泰又提出给我蒙古保安统监名义呢，蒋在南京见我时为什么又提出建立张北分校呢？据我现在的看法，蒋介石这样重视我是有原因的，他对于我的职位问题的前后几次变动，也是有其用心的。在蒋看来，我旗是通往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要冲，如在我旗组织起一部分武力，不仅对于附近的杂牌军队能起牵制作用，而且为了"防共"，也有必要。所以蒋介石特派桂永清到我旗察看情况时，才有向我建议组织蒙古骑兵之事。至于我到武汉见蒋后，杨永泰又提出要给我蒙古保安统监名义而不给我以蒙古骑兵师长的实权，则又是想利用我作招牌而不愿叫我掌握实力。蒋在南京中央军校和我谈话时所提出的建立张北分校的计划，实际上是叫桂永清为他培养军事干部，掌握实权。后来一九四九年我到南京时，桂永清已当上了海军总司令，他特设宴招待我，席间他情不自禁地说："如果依照我从前的计划，在内蒙古组织起五万骑兵，东北不会叫共产党拿去，也不会造成今天这个局面。"

足证当时蒋介石是要假手我插足内蒙组织骑兵进行反共的。

在南京见蒋后，我即将韩凤林留下当教官，并以需用军事人才为名，向高级教育班交涉，要出了正在受训的蒙古学生云继先。又向军政部具领迫击炮二门及武汉行营许可的步枪几百支。还到中央政治学校蒙藏班参观，和正在求学的蒙古青年见了面，对他们进行拉拢。

这时，从蒙古人民共和国逃亡的迪拉瓦还在南京，我和他常相过从，他对我有很大的影响。

我上次到武汉见蒋是想取得蒙古的军权，这次赴京请愿是想取得蒙古的政权，但均未如愿以偿，于是便想搞自治，以实现我的政治野心。我偕同一部分代表回到北平后，又和旅平蒙古知识青年作了广泛的接触，招收了二十余名蒙古学生，由云继先、于福赓和云敬圣带领着随我一同返旗，着手培养人才，蓄积力量，准备待机而起。

我回旗后，即在西营盘成立了蒙古干部学生队，委派云继先、于福赓二人为教官，把从北平招来的学生一律编入该队受训，把从武汉和南京所领到的武器拨归该队应用。这时我认为即便中央军校张北分校成立起来，毕竟是国民党中央的系统，一切须受他人的监督，不如自办一个学生队，训练自己的干部方便。不久，陈绍武、陈国藩、霍宝书、乌鹏、王泽春由绥包一带前来我旗，丁我愚、亢仁等也相继前来。我和他们常相聚谈，共同研究时局，并决定由锡盟联合乌、伊两盟发动内蒙"自治"，以期实现我在内蒙古掌握大权的野心。

3. 策划内蒙"地方自治"运动的经过

我虽然罗致了一部分蒙古青年，作为我的骨干，但自知我的职位不过是副盟长，声望不高，年纪又轻，号召各盟旗参加，必须得到"年高望重"之王公的同情和支持。特别是在锡盟进行"自治"，首先必须取得盟长索王的赞同和杨桑（杨桑曾任过锡盟盟长）等老年王

公的谅解。杨桑向以我的前辈自居，认为我好大喜功，时常流露不满之意，曾有“锡盟出了一个苏尼特王，不知什么时候闯下乱子，锡盟前途殊堪忧虑”之语。盟长索王对我也是不满的。因此，必须设法说服他们同情“自治”，最低限度不致出头阻挠“自治”。我反复考虑结果，认为通过班禅来说服他们是个最妥善的方法。回忆起来，这个方法还是郭道甫和我谈过的。当一九二九年我随同班禅去沈阳面见张学良洽拨武器时，曾与郭道甫（这时郭任东北蒙旗师范学校校长）常相过从。他曾煽动我说：“外蒙独立前曾有哲布尊丹巴这个宗教领袖，在蒙古民众中形成了中心信仰。反观内蒙没有中心信仰，以致历次运动都无成就。现在听说班禅的堪布们正请中央用武力护送班禅回藏，一时尚恐不能实现，趁此机会，应当联合各旗集资在蒙地为班禅建庙，请班禅留在内蒙，作为宗教领袖，形成中心信仰，对我们进行蒙事，是会起到一定作用的。”

郭道甫这个建议，我很以为然，返归锡盟后，即和盟长索王商量。索王也极表同意，当派我和松津旺楚克（浩济特左旗札萨克郡王），代表锡盟前往北平联络各盟旗王公，商洽为班禅在内蒙建庙，挽留班禅在内蒙长期居住，各旗王公一致表示赞成。这时班禅正在北平，郭道甫也因事来平，我们就去面见班禅，确定在锡盟和哲盟各建庙一所。嗣因“九一八”事变发生，哲盟已经沦陷，遂将各旗凑集的十万余元，在我旗和乌珠穆沁右旗为班禅建庙二所。在一九三一年并请班禅前来我旗过冬，一九三二年夏在锡盟各地讲经。这样做，既取得班禅对我的好感，也使锡盟各旗王公对班禅有深刻的印象。

迨至一九三二年，我正和那班青年研究进行“自治”运动，设法说动索王同意时，适班禅由乌盟百灵庙前来我旗，并要去贝子庙、乌珠穆沁右旗等地讲经。我认为机不可失，遂请班禅帮助我，同他前往乌珠穆沁右旗，说服索王。我陪同班禅到达后，索王对我谈田中久要来设置特务机关和电台，问我怎办。我不敢同他直接谈“自治”的事，答复他说：“班禅佛爷正在此地，何不请求佛爷指示明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路。"索王就同我去见班禅，请示对策。班禅说："前次德王和我说的联络锡、乌、伊三盟会商蒙事，很好，现在正是时候了，积极去做就对了。"索王当下也表示赞成。于是第一步说服成功，就请索王以盟长名义拟成公文，派我代表锡盟去见乌盟盟长云端旺楚克（云王），随后并加派乌珠穆沁右旗的协理若乐格尔札布一同前往。我遂偕同亢仁、丁我愚、阿乐腾格尔勒等驰赴百灵庙，先派员送去公文并向云王表达请其出面倡导"自治"之意，云王当时还徘徊不定。恰在此时，蒙藏委员会蒙事处处长巴文峻等一行前来宣抚，经四子王旗等地到达了百灵庙，亢仁当将我等候云王前来研究倡导"自治"问题告知巴，我也请巴去劝说云王。巴文峻知道"地方自治"的名义尚在国民党中央许可之列，遂允前往劝说云王。云王这才表示愿意与我共同倡导"自治"，并率同其弟根敦札布和仕官沙拉巴多尔济、那逊瓦齐尔等前来百灵庙。这时乌珠穆沁右旗台吉若乐格尔札布也赶来参加，遂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在百灵庙举行了第一次"自治"会议，八月二十四日发出通电。九月二十八日，举行第二次"自治"会议。不久，国民党政府派黄绍竑、赵丕廉来百灵庙，经过许多周折，终于决定设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并于一九三四年四月下旬在百灵庙举行了成立典礼。

蒙政会成立后，由于委员长云王（云端旺楚克）、副委员长索王和沙王（沙克都尔札布）皆年老多病，我即以蒙政会秘书长的身份代行委员长职权，把蒙政会的大权抓到手中。这样，我也就成为日寇的主要拉拢对象了。

4. 日寇在多伦召开蒙古王公会议并对我加紧拉拢

当时日寇对于内蒙西部各盟旗王公所进行的种种威迫利诱阴谋，是企图诱使各盟旗加入伪满或者在它的卵翼之下建立傀儡政权。因此，它对于我们发动的"自治"运动最初是不感兴趣的。当我们在百灵庙举行"自治"会议时，潜伏在我旗的日本间谍笹目曾向韩凤林表示说："你们发动自治太早了，时机还未成熟，不如等到我

们日本军的力量达到这里时再发动为宜。"当黄绍竑、赵丕廉来百灵庙，决定成立蒙政会后，因为我对这个决定极不满意，除通知各盟旗选派代表到南京请愿外，并曾派韩凤林前往北平日本使馆办事处，探询对内蒙"自治"的态度。韩凤林回来报告说："日本使馆的紫山武官说现在中日之间存在的问题很多，不断发生冲突，但仍保持邦交，内蒙自治日本不便出面干涉，言下颇为冷淡。"我听到韩凤林报告后，还以为也许紫山武官是日本的外交人员，不便表示对内蒙"自治"的态度，乃又派补英达赖前往伪满面见溥仪，并通过溥仪的介绍与日本关东军吉冈安置参谋接洽，托辞购买枪枝，探询日本关东军对内蒙"自治"的态度，也没有得到明确答复。

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当黄绍竑、赵丕廉二人来百灵庙期间，日寇为了加紧拉拢各盟旗王公"归向"伪满，特由驻在北平的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和驻在多伦的松井大佐在多伦召开蒙古王公会议，邀请锡、察两盟的王公和总管参加。会议原定一九三三年十月一日举行，嗣因交通不便，时间迫促，届期未能到齐，改为是年旧历十月一日举行。我当时因为热衷于"自治"运动，正在百灵庙主持第二次"自治"会议，所以对松室孝良召开的会议并不十分重视，仅派札兰阿乐腾格尔勒代表前往参加，观察会议情形和探询日本对蒙政策。据阿乐腾格尔勒回来向我汇报说，参加这个会议的有索王代表胡图里管旗章京、驻张家口办事处处长宝道新和乌珠穆沁左旗的多布丹公。锡盟其他各旗前往的多为管旗章京、梅勒等，盟长和各旗札萨克都没有去。察哈尔保安长官卓特巴札普也是派一副官为代表。东部盟旗参加者，有伪满的多伦警备司令官李守信、兴安西省警备军代理司令官乌古廷，还有联络工作人员金永昌、于兰斋、吴尧臣等。松室孝良在会上讲话，竭力挑拨民国后的汉蒙民族关系，怂恿各盟旗加入伪满。他说："成吉思汗向西进兵曾打到欧洲，建立雄跨欧亚威震世界的赫赫武功；反之，向东发展就受到挫折，例如元朝东征日本曾全军覆没。根据这个历史教训，现在你们应当向西发展，我们大日本帝国愿意大力帮助你们收复长城以北的故有疆

土，再进而联合西部各盟旗，加入‘满洲国’，或组织共同政府与满洲合作，希望你们蒙古要主动走向这条途径。”松室孝良讲话后，与会代表除表示愿意与伪满合作外，还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东部盟旗在“满洲国”仅得到东、南、西、北四个兴安省的组织，连蒙古二字都没有了，怎能吸收西部各盟旗？（二）既然满蒙合作，为什么不称“满蒙国”而称“满洲国”？松室孝良解答说：“四个兴安省既然不能吸收全部盟旗，应当在‘满洲国’中央扩设蒙古行政机构，在地方增设行政机关。至于改‘满洲国’为‘满蒙国’问题，因牵涉到国内和国际问题，需要慎重考虑，我很难作出回答。”与会者认为各盟旗长官均未参加会议，他们无权作出决议，只有将这次会议精神和松室孝良的意见，各回本旗报告，再行研究决定。

阿乐腾格尔勒还带来松室孝良给我的信函，对我发动内蒙“自治”表示祝贺，并以所谓大蒙古主义来煽动我，要我“收回”长城以北的蒙古“故土”，“恢复”成吉思汗的“伟业”。这就充分说明，日本帝国主义对西部盟旗王公，在用满蒙联合的阴谋诱归“满洲国”未成之后，又改以所谓大蒙古主义作为煽惑的口号了。

黄绍竑、赵丕廉离开百灵庙后，我偕同韩凤林返归我旗转赴乌珠穆沁右旗，向索王报告经过，潜伏在我旗的日本特务笹目亦搭车同往。到达后恰逢盛岛角芳也在该旗。据韩凤林向我报告，笹目指责盛岛说：“你还在此地干什么？现在蒙古的中心人物是德王，是我找到的主要争取对象。”笹目为了拉拢我，从乌珠穆沁右旗返归我旗后，就回国组织“善邻协会”，旋又带同前川、野中等来到我旗，送我收音机、电台等礼物，并在我旗和贝子庙等地设立“善邻协会”的分支机构，以办理卫生文化事业做掩护，暗作特务活动，拉拢各旗王公。如这时阿巴哈那尔旗协理巴萨尔高尔达，就和驻在贝子庙的“善邻协会”负责人野中拉上了亲密关系，后来得以当上伪蒙疆银行总裁的重要职位。不久，“日本东京善邻协会”本部理事长井上璞前来我旗访问，我就通过他和“善邻协会”的介绍，派陈国藩、暴德彰、乌鹏、霍宝书、李成俊、云瑞龙等赴日留学。

盛岛角芳也于一九三四年夏潜来百灵庙，住在迪力瓦领来的外蒙人聚居的瓦齐尔达拉部落，邀我前往晤谈。我即以到野外试验电台为名，偕同韩凤林前往相见，由韩做翻译。盛岛告我说：前次补英达赖向关东军接洽购买枪支一事，关东军准备无价送给步枪二千支，现已运到林西，叫我派车运回。盛岛走后，我即派汽车前往林西洽运，计第一次运回二百支，都是捷克式新枪，第二次运来的却是套筒式旧枪，因此再未洽运。

一九三四年夏，我和韩凤林由百灵庙返归我旗，途中遇见两个赴百灵庙的西洋人，据他们说："听说有两个'满洲国'高级军官来到你的王府。"我返旗时来人已走，我的长子都格尔苏隆说，来的是"满洲国"兴安南警备军司令官巴达玛拉布坦、兴安西警备军代理司令官乌古廷和一个日本军官。我和韩凤林乘小汽车赶到阿拉善图庙始将他们追上，当在庙上相见。那个日本军官可能是本间或植山，现记不清了。我用蒙语问巴、乌："东蒙情形怎样？"巴答说："日本帮助我们组织了兴安警备军，设立了兴安军官学校，情况还好。"接着他问我："西蒙情形怎样？"我答说："现在蒙政会虽已成立，但在绥省却不断发生冲突。察省当局也在嘉卜寺增设化德县，意在化我。"乌古廷说："日本军将来可能西进，望你与之合作并予协助。"我答说："这要看看日本是否愿意帮助我们，再作决定。"

5. 韩凤林被杀及对我的影响

百灵庙蒙政会成立后，仅领到开办费二万元，用以维持办公和职员的生活，每人支给十五元生活费，仅够伙食之用。尽管屡次向国民党中央政府有关部门请领经常费和建筑费，亦无结果。我因急欲解决这个迫切问题，特密派陈绍武前往庐山面见蒋介石，一则报告日本人进出西蒙，请示如何对待；再则请拨经临各费及枪械电台等物，以济急需。我并嘱陈绍武将伪满巴达玛拉布坦和乌古廷二人同我见面一事向蒋报告，并且故意夸大其辞说，据巴、乌表示，日本方面不久就要西进，攻打察东，要我从速表明态度，以实力相助。我

企图借此危言耸听，以促使蒋介石重视内蒙问题，并探询他的对日态度。结果蒋介石准予拨给每月经常费三万元、建筑费十二万元及枪械电台等物，嘱向南京有关部门洽领。至于怎样对待日本人进出西蒙问题，蒋介石只笼统答复说，要以"不卑不亢"的态度相机办理，并嘱陈绍武转告我，他不久即来绥远巡视，嘱我和云王前往晤谈，还叫陈绍武给我带来复信一封，内容和对陈绍武所说的大致相同。

不意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韩凤林被捕事件。在韩案发生以前，蒋介石蓝衣社的特务李才桂带了一批特工人员，以"内蒙旅行团"名义前来百灵庙。我要韩凤林负责招待李，但韩对李态度傲慢，李极为不满。同时，日本人常来锡盟和百灵庙拉拢我，我因韩是日本士官学生，便由韩担任日语翻译。李才桂可能因此认为韩凤林从中拉我勾结日寇，便报告了蒋介石。当韩凤林到北平戒大烟瘾时，第二天就被宪兵三团派官兵十余人来韩家将韩捕走。

韩被捕后，蒙政会驻平办事处处长包悦卿曾面见何应钦质问韩究犯何罪，要求释放。何应钦矢口否认说他不知此事，允为注意访查下落，设法营救。但韩终未得释，仅由北平军分会给韩的家属送去五百元，作为救济。蒙政会成立后，我曾派包悦卿、郭尔卓尔札布赴平敦请何应钦就任指导长官，何应钦答复不久来绥转赴百灵庙。韩案发生时，何应钦适来绥包视察，白海风劝我往迎何前来。我因韩凤林被捕，负气不去，仅以电报相邀。何复电称急待返平，无暇前来。为了救援韩凤林，我曾径电蒋介石要求释放，并说李才桂与韩案有关。蒋来电答复说："韩案发生，蒙胞既然怀疑才桂，显见才桂有不洽蒙情之处，应即撤销其内蒙旅行团团长的职务。"不久李才桂就离开了百灵庙。

到了是年秋天，蒋介石将到绥远视察，在他未到之前，先派萧振瀛带着金丝猴皮袄等礼物前来百灵庙，邀我和云王赴绥相晤。我同一些亲信研究可否赴绥。多数认为我与绥省当局的关系既不甚好，外边还有谣言，深恐赴绥被扣，劝我不要前往。嗣我又与陈绍武

单独商量，陈极力劝我前往，同蒋进行拉拢，并商洽解决绥蒙之间的纠纷问题。我也认为既系蒋介石相邀，谅绥省当局不会把我怎样，遂和云王、包悦卿、陈绍武等赴绥等候见蒋。

蒋介石由宋哲元陪同到达归绥车站时，我和云王曾到车站迎接。蒋下车后首先与云王和我握手，接着又召见我和云王，包悦卿、陈绍武也随去。蒋先问云王蒙政会成立之后诸事如何，云王答称："我是年老多病，诸事多亏德秘书长帮同办理。"蒋又面向我说："方才云王说，你帮助他很好，今后仍希你尽力帮助云王，作好蒙政会工作。"继又指着陈绍武向我说："你前次派他到庐山所要求之事，想都和你说了吧，今后如有什么困难，尽管向我说，我当设法解决。"我当将韩凤林被捕之事提出，要求蒋解决。蒋即答复我说："这事我返京后当详为查问，待到一月后总会得个水落石出。"接着我又向蒋表示，蒙政会愿献军马三百匹，答谢政府许可"自治"和关怀蒙古的盛意。蒋也表示接受。继而绥远各界首脑集会请蒋介石讲话，邀我和云王、包悦卿等参加。蒋讲话后，邀请云王和我讲话，云王推托未讲，我遂登台致词把蒋介石大捧了一番，大意是说："自清朝以至现在，国家最高元首只有两位到达我们这个边远地方，前次是康熙，这次是蒋委员长，但是康熙是为征服我们蒙古而来，蒋委员长是为帮助我们蒙古而来，我们表示竭诚欢迎。"我用蒙语讲完后，由包悦卿用汉语翻译。蒋介石听了我这套吹捧之词，自然十分高兴。

我从归绥见蒋后返回百灵庙，当用蒙政会的经费购买军马三百匹，派补英达赖、刘建华送往南京军政部。约莫一个月的时间，接到以"北平民众锄奸团"名义印发的一个传单，大意是说："韩凤林是勾结日本、背叛党国、出卖民族的汉奸，实属罪大恶极，为全国人民所痛恨，已经作了断然处置，沉之大海。"我接到这个传单，和丁我愚研究，认为这是蒋介石耍的一个花招，他不好正面答复我，所以用这种手段作为变相的通知。我虽推断韩凤林已死，但还抱万一希望，同时韩的家属又要求我营救，于是就叫丁我愚拟具了一个电

报，详述李才桂来百灵庙作侦察活动和不满韩凤林的情形，以及韩到北平时被宪兵三团逮捕的经过，以云王和我的名义，再电请蒋介石予以释放，并坚决表示如再不释放，我等实在无以对同仁，只好恳请辞职，以卸仔肩。这个电报发出后，蒋介石复电责备我们说："君等任意推断，肆意要挟，尚知国家有纪纲否？"使我很不痛快。

我曾令稽查处主任李凤城检查蒙政会内部人员来往信件，发现云继先给朱实夫来的一封信，其中大意说："韩凤林被捕后，秘座（指我）对实夫兄怀疑甚大，应加注意。对保安总队长一职，务要尽量争取，我们谁干都可以，务使不要落于他人之手。同时又据曾在干部学生队受过训的人员向我告密说：云继先、朱实夫联络在蒙政会任职的土默特旗籍人员，策划掌握保安队的官兵，争取保安总队长的职位。因此，我对云、朱有了怀疑，云、朱对我也有了戒心。这就种下了后来云、朱策动保安队兵变的根源。

一九三四年秋天，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乘坐飞机前来我旗活动，其目的是想拉拢我进一步投靠日本。他对我说："你进行蒙古工作怎样？有没有困难？如有困难时，可向我说，我当尽力帮助。"接着他又自吹自擂地说："我到哪里，哪里的中国官员都怕我，因为中国政府的事情都瞒不了我。"我就把韩凤林在北平被宪兵三团逮捕的事情告诉他，希望他帮助调查了解一下。他很自负地说："我能有办法知道，俟我详细调查一下再行告知你。"过了一个时期，他通过驻在我旗的特务机关长宍浦转告我说："国民党中央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赴庐山向蒋介石请示机要工作时，蒋介石就命令蒋孝先速把韩凤林设法逮捕处死。蒋孝先即密电驻在北平的宪兵第三团吴团附负责处理。当韩凤林来平时就有特务人员尾随前来，韩到达时即被逮捕，当天晚上即行枪杀。"

我在韩凤林未被蒋介石暗杀以前，很想凭借蒋的势力来扩充自己的力量，因此尽量和蒋拉拢，对日本方面则采取应付的态度。迨韩凤林事件发生后，我感到依靠蒋介石来扩充实力，等于与虎谋皮，已不能再存幻想。我曾一度采纳蒙政会电台总台长关起义所提

的多边外交的建议，派刘建华赴广州和正在搞西南独立的胡汉民、陈济棠集团取过联络，请其支援内蒙"自治"。刘建华到达广州后，把我大吹大擂了一番，竟说我在内蒙握有三万骑兵云云，但也没有什么结果。他只是得了胡汉民赠送的旅费五百元，返回百灵庙时，给我带来一个用象牙刻有胡汉民、陈济棠、萧佛成等十数人名字的精致赠品和信函一封，信内虽表示愿意赞助，但没有实际支援。我也认为西南与蒙古相距甚远，仅能声援，无补实际。从此，我同国内各方面没有再作什么联络，干脆进一步与日本人勾搭起来了。

6. 我进一步勾结日寇及吴鹤龄所谈蒋介石准备放弃黄河以北一事对我的影响

我曾把企图利用日本的力量来扩充实力的打算，分别同亲信干部陈绍武、丁我愚等商量，他们都表示同意，愿意跟着我走。于是，我首先决定秘密派宝贵廷赴伪满招兵。

我和宝贵廷事先商量好，叫他故意在职员中散布不满情绪，提出辞职，我则故意向职员们斥责宝贵廷的要挟，准其辞职。这样散布烟幕之后，宝贵廷就于一九三四年冬带着我给伪满察东警备军司令官李守信和日本驻在多伦特务机关长植山的信密赴多伦，在植山和李守信的协助下，从东部各盟旗招兵买马，秘密练兵。我把招来的一部分士兵先在李守信的隶属下成立一个团，由宝贵廷任团长，后又派去乌云飞、任殿都、云麟、巴图等充当连排长，并计划逐步扩充。

不久，日本关东军把宝贵廷从多伦叫去，告知他现已决定把驻在乌珠穆沁右旗的特务机关长宍浦调任苏尼特右旗的特务机关长。宝贵廷遂偕同宍浦前来见我说明来意，经我准许在我旗设立日本特务机关和架设电台，以资加强联络。我和宍浦研究保密办法，结果商定，宍浦化名石田三雄，仍以"善邻协会"理事名义做掩护。我和日本的勾搭便由此有了正式的固定关系。

接着日本关东军蒙事处第二课长石本寅三与参谋田中隆吉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